

拉雅·杜纳耶夫斯卡娅对列宁 《伯尔尼笔记》的三重解读

张楚依

云南大学

摘要：拉雅·杜纳耶夫斯卡娅对《伯尔尼笔记》进行三个维度解读，得出以下核心结论：其一，列宁始终立足唯物主义理解黑格尔辩证法，其所谓“新东西”体现为从庸俗唯物主义向辩证唯物主义的转向；其二，列宁在《伯尔尼笔记》中，对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进行了创造性阐发，并凸显了历史辩证法的核心维度——人民群众作为革命主体的能动的实践；其三，杜纳耶夫斯卡娅在列宁关于革命主体的辩证法思想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新激情、新力量”的革命主体再思考。

关键词：伯尔尼笔记；辩证法；革命主体；辩证人道主义

一、列宁思想超越庸俗唯物主义的自我“突破”

杜纳耶夫斯卡娅对列宁的思想发展过程有一基本判断，即存在一个显著的“断裂”时期，其“断裂点”即为《伯尔尼笔记》。她指出，这个时期的列宁通过对黑格尔著作的深入研读，完成了思想的自我突破：

“列宁的《哲学笔记》显示出，他对自己关于唯物主义的或经济的力量与人的主观力量之间、科学与人类活动之间关系的观念，进行了何等彻底的重新组织。”^{[1]156} 杜纳耶夫斯卡娅将列宁思想的突破总结为：（列宁）结束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绝对对立的他者视阈，将两者以辩证的视角进行统一理解。

第二国际的瓦解是促使列宁思想转变的现实原因。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对1914年战争的支持构成对无产阶级的背叛，这是作为“实践着的俄国革命者”^{[1]160}的列宁所不能容忍的。第二国际的崩溃意味着那些此前自诩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破产，列宁不得不与过去的思想决裂，并寻求新的哲学理论基础。此前，包括列宁在内的第二国际的学者仅将黑格尔辩证法视为学术论争的工具：“在此之前，对列宁以及第二国际的其他人来说，黑格尔的辩证法的重要性，仅仅在于它是内部辩论的一个参照点。如果一个论辩对手表述晦涩，他就会被谴责为辩证法的诡辩论，人们就提醒他，马克思早已把头足倒立的黑格尔颠倒过来了。”^{[1]158} 在他们看来，马克思对黑格尔的“颠倒”仅仅是以“物质”取代“绝对精神”。然而，第二国际的破产使列宁意识到，革命实践亟须一种新的哲学思想支撑。因此，他将目光投向黑格尔辩证法。杜纳耶夫斯卡娅指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下文简称《唯批》）与《伯尔尼笔记》的对立反映了列宁思想的突破，在《唯批》中列宁对黑格尔持否定态度，认为无法从其唯心主义

体系中提取有价值的内人：“无法从绝对唯心主义粪堆中啄出‘珍珠粒’。”^{[2]243} 而在《伯尔尼笔记》中，列宁用“说得妙”、“有特色”等字眼毫不吝啬地称赞黑格尔在《逻辑学》中的观点^{[3]235}，指出辩证的唯心主义比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更接近辩证唯物主义。第二国际的破产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列宁在哲学上对《唯批》中的唯物主义立场进行反思。在《唯批》中列宁还处于普列汉诺夫的他者语境中，不可避免地落入庸俗唯物主义，而《伯尔尼笔记》的核心思想就是反对庸俗唯物主义。

列宁思想的转变不仅源于对第二国际理论的批判，也是出于其自我反思的内在需求。这一自我突破可概括为对黑格尔辩证法从“困惑”、“认同”到构建自身理论体系的过程^[4]。初读《逻辑学》时，列宁的态度极为审慎。通过“存在论”第一篇的笔记可以看出，列宁仍然处于被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影响的困顿中，以至于这一篇的笔记中大量出现“费解”、“不明白”和“高深莫测”等字眼。这个阶段的列宁仍然是站在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性理解的角度去审视这个“颠倒的唯物主义”，然而，随着阅读的深入，列宁意识到观念与物质的内在联系，站在历史的高度上理解黑格尔的辩证法不是庸俗唯物主义般的“颠倒”，黑格尔辩证法本身就蕴含着革命的内涵。从这个意义上，列宁已经开始站在新的高度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与《唯批》中将唯物主义直接等同于自然科学不同，列宁认识到了机械唯物主义的弊端，并用了三个感叹号加以强调，同时，他在“本质论”一章中将规律等同现象的静止反映，并提出规律是本质的现象。杜纳耶夫斯卡娅指出，在“本质论”一章的最后，列宁以“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而且创造客观世界”^{[5]182}

实现了与机械唯物主义及不彻底的经验主义的决裂。相较于《唯批》中“我们要感觉,首先就得呼吸;没有空气,没有食物和饮料,我们就不能生存。”^{[6]128}所表现的反映论,列宁首次将人的有目的的活动至于与自然界同等重要的地位^[7]。他强调,外部世界的规律是人的有目的的活动的活动的基础,但人的实践并非简单受制于这些规律,而是通过亿万次的重复,赋予逻辑形式以公理的意义。杜纳耶夫斯卡娅认为,列宁在这里指出了黑格尔哲学中所表现出来的唯物主义因素,同时也标志着对自己之前的哲学的决裂和其自身哲学立场的根本转变,即从《唯批》中的庸俗唯物主义哲学理论,转向强调思想自我运动的辩证唯物主义。即使这种转向并没有以专著的形式表现出来,但在《黑格尔辩证法(逻辑学)的纲要》中,列宁以小结的形式开启了他对马克思主义更加深入的总体性把握。一种阐扬思想自我运动的全新出发点^{[8]104}。

二、列宁的辩证法作为革命辩证法

杜纳耶夫斯卡娅提出,在列宁之后,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辩证统一的问题未再有实质性突破。她指出,社会主义革命问题是列宁在《伯尔尼笔记》中关注的核心。列宁关注的不再局限于俄国的革命,而是世界范围内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从哲学意义上说,是“关于对立面转化的辩证法问题,是哲学与革命关系的意义问题”^{[8]108}。第二国际的崩溃使得列宁看到了革命内部存在着反革命因素和向对立面转化的辩证运动。面对这一历史转折点,列宁的理论探索让他重新把握了自我运动的辩证法与主体一实体的辩证关系;以此为基础,他进一步洞察到马克思主义运动内部潜藏的反革命倾向,并辨识出民族运动中所蕴含的新兴革命力量。正是通过对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的改造,列宁得以将哲学与革命、理论与实践统一起来,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8]108}。

《伯尔尼笔记》后,列宁突破了此前庸俗唯物主义的思想束缚,重新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语境,真正将辩证法视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在场。因此,列宁在当时文本无法给出答案的困境中才能够带领布尔什维克走向革命实践。在革命即将爆发的前夕,列宁完成了自我思想的突破后就立马投身到现实斗争中。列宁运用辩证法所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对经济宿命论的反驳。早在1902年,列宁就批评过“经济主义者”们将工人活动限制在经济斗争的范围内,而政治斗争却是资产阶级民主派中的先进分子的任务^{[9]367}。到了1914年,资本主义达到垄断阶段,在资本主义后发的国家的人民深受帝国主义国家的压迫,列宁看到提出

民族自决口号的紧迫性:弱小民族虽然在反抗帝国主义斗争中力量有限,却起着酵素和菌种的作用,帮助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这正是历史的辩证法^{[10]350}。但“帝国经济主义者”们再一次将经济与政治的关系加以歪曲,在民族自决权问题上持反对态度,认为这种民族自决是不可能实现的,是“空想和反动的”。列宁指出,说自决不能实现是指在经济上不可能,那是根本不对的,因为他们所谓的经济分析实质上是用政治范畴来给自决权下定义,实际上,他们根本没有弄清楚经济与政治的关系^{[6]780},或者说,“帝国经济主义者”们将经济与政治抽象对立起来。考茨基认为列宁在这里犯了唯心主义的错误,过分强调人的主观意识,但列宁将考茨基所坚持的经济宿命论称为契诃夫的“套中人”^{[11]248}。拉雅指出,列宁与他们的斗争不是因为他们是“非革命者”,而是因为他们的思想是非辩证的,即片面强调经济的必然性,严格按照生产力发展规律去解释革命,甚至等待革命意识的自我生成。在《伯尔尼笔记》中,已经可以看出列宁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从而脱离用反映论去理解实践。1917年,在与布哈林关于民族自决权的论战中,列宁指出,布哈林对民族的片面理解实质上是一种抽象革命论,因为他(布哈林)只是把劳动者当作对象而不是主体来对待^{[8]101}。可以看出,在对待革命问题上,列宁已经开始运用辩证法来分析革命形势,十月革命的胜利,也是对列宁正确将辩证法运用到革命中的有力体现。

拉雅·杜纳耶夫斯卡娅认为,之所以将列宁称为“继马克思之后真正将理论与实践统一起来的人”是因为列宁将辩证法带到群众中去,而非由少数哲学家垄断^{[8]103}。列宁最终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的基础,是他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讨论,拉雅将该讨论称为“对被割裂的整体性的恢复”^{[12]110}。“即使是工人的国家,如果不把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工人变成结束一切阶级统治的基础,也不会消亡。这一点成了他的理论与实践的关键。这是以真正的黑格尔—马克思方式对思想的重新组织。”^{[11]79}这意味着列宁对第二国际理论家对马克思关于取代资产阶级国家的思想的歪曲的清算,“这种歪曲不是词句上的歪曲,而是对工人阶级运动与志向的歪曲。”^{[11]80}对列宁而言,人民群众不再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手段,他们的自我活动本身就是社会主义。这一切使自我运动的观念更为突出,成为辩证法的内在核心,也使辩证法与折衷主义的对立更加鲜明。因为革命的核心哲学概念不是对过去革命的“研究”,而是对正在到来的革命的准备^{[11]80}。可以看到,

第二国际破产以后,列宁一直在寻找革命的新的可能性,而黑格尔的辩证法使其重新发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主体向度:作为革命主体的群众的革命斗争^[13]。

三、革命辩证法的主体性问题

拉雅·杜纳耶夫斯卡娅将列宁建立的这种革命辩证法理解为“行动的辩证法”,即“作为理性的群众的辩证法”^[1163]。这是拉雅基于列宁所处的时代背景进行的判断:“第二国际”的破产使得列宁对新的革命力量进行了更深的思考;而1916年,爱尔兰爆发了工人起义,爱尔兰人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使人们看到了革命的新的可能:人类争取自由的斗争不仅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力量,而且是一种物质力量^[1163]。拉雅认为,列宁的革命辩证法在讨论革命主体问题时,看到了帝国主义压迫本身就造成了一种新的革命力量,这种力量将在无产阶级革命中发挥酵素的作用^{[8]108}。根据她的观点,在《伯尔尼笔记》中列宁看到了黑格尔辩证法中以“绝对”为主体的思想运动,并把“绝对”转化为群众的自由创造力,即群众自发的革命运动。列宁通过黑格尔辩证法中的主体创造活动,建立了以群众作为革命主体的革命辩证法。在列宁与布哈林的对话中,拉雅认为列宁已经开始强调在解释理想与现实的关系时,不要迷恋“因果性”,而应着眼于自由与主体性“概念”的真正所在,即着眼于群众的自由创造力^[1164]。可以看到,在《伯尔尼笔记》中,列宁已经从早期追随考茨基“社会主义意识是某种从外部灌输到无产阶级阶级斗争中的东西,而不是从它内部自发地产生的东西”^{[14]443}转变到革命辩证法。而革命辩证法的主体向度应该指向实践着的历史的主体,即自我运动的革命群体,只有他们才能内发地创造解放自身的历史可能性。而理论需要在工人自身的行动与思想的基础上不断地进行塑造和再塑造^[1163]。也就是说,理论需要革命主体在行动和思想中不断地对其进行检验,才能做到真正的指导实践。这种运动不是从外灌输的,而是革命主体自我运动的结果。

在群众和党的关系问题上,列宁不再抽象地讨论党、群众等概念,而是以一种全新的辩证统一的方式去理解这些概念。建成社会主义的根本在于确立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这意味着不能由少数人或政党包办,而必须建立一个由全体劳苦大众参与的、群众性的国家治理体系^{[15]320}。拉雅认为,1914年以前的列宁身上存在着一个矛盾,即实践上的辩证法家与思想上的考茨基追随者之间的矛盾^[1174]。在《伯尔尼笔记》中,列宁第一次意识到革命必须深入到工人阶级的“更

深和更低”的层次中去。因为这种深入到工人阶级的“更深和更低”层次的思想,才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1175]。在阐明群众和党的辩证关系之前,列宁提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首先要回答的是,无产阶级组织的目的是什么?在关于无产阶级组织问题的思考中,列宁从哲学层面对其进行了考察,即要在承认一切事物自身都包含矛盾这一点上更进一步,寻找解决矛盾的方法^[1175]。在工人自发运动的推动下,列宁看到了工人自发运动的力量,并意识到社会主义意识在工人群众中自发生成的可能性。因此,他对革命群体提出了新的要求:“我们现在最直接的问题是组织,不是以通常的方法来影响通常的组织,而是要吸引广大的群众,并且使军队、国家和国民经济问题都体现在这个组织之中。”^[1177]

四、结语

拉雅·杜纳耶夫斯卡娅对《伯尔尼笔记》的解读中包含着对自身“辩证人道主义”的理论建构,可以说,她用来解读《伯尔尼笔记》的方法也是她构建“辩证人道主义”的基础。在《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一书的晨侧版导言中,拉雅·杜纳耶夫斯卡娅说:“我们的时代一直聚焦在革命辩证法这一决定因素上。任何问题,包括组织、政党等等,都逃脱不了这个决定因素。甚至绝对方法本身也不过是通向绝对观念、绝对精神的道路。当自我思想着的观念与自由的自我生成一同降临时,我们就会得到真正的自由。”^[1130]“辩证人道主义”是拉雅基于马克思和列宁与黑格尔在辩证法问题的关系上所提出的依靠新的革命主体,即“新激情、新力量”在当下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实现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最终实现人的解放。进而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新的阐释的理论^[169]。拉雅·杜纳耶夫斯卡娅将《伯尔尼笔记》看作列宁从庸俗唯物主义向革命辩证法的转折点,列宁在阅读黑格尔原著的过程中完成了这种转变,并将辩证法运用到现实革命中,并看到了革命辩证法中的主体向度,从而完成了主体辩证法的创建,即自发、现实的群众运动。在她看来,无产阶级的解放需要依靠群众的自发性运动,而不是外部力量,因为这个“外部力量”有物化的风险,即“向资产阶级分化”。与此同时,她还强调:人不是客体,而是主体,这不仅由历史决定,还由它的创造者决定。世界历史的运动是劳动的自我发展和其阶级斗争^[1615]。然而,西方左翼知识分子将马克思主义仅仅作为一种批判理论,“无产阶级”成为了一种抽象概念的趋势。因此,恢复自发的、实践着的革命主体成为了“辩证人道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13]。在拉雅看来,实现人类真正解放

的运动是将群众 (masses) 争取自由的实践理解为一种来自实践的运动, 而实践本身就是一种理论形式, 并需要用一种来自理论的运动来满足这一点, 而理论本身就是哲学和革命的形式^{[16]13}。

总而言之, 拉雅·杜纳耶夫斯卡娅认为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担起最终实现解放全人类的“彻底的人道主义”的重任, 因为无产阶级不仅是革命的力量, 也意味着无产阶级是“主体”, 一个普遍的主体, 不仅是历史的产物, 也是废除剥削的事实。被剥削阶级是“现实的变革者”^{[16]28}。

参考文献:

- [1] 杜娜叶夫斯卡娅. 马克思主义与自由 [M]. 傅小平, 译.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8.
- [2] 《列宁全集》第14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0.
- [3] 《列宁全集》第38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0.
- [4] 陈爱萍. 批判与重建: 列宁与庸俗唯物主义的决裂及其意义——基于对《伯尔尼笔记》的文本解读 [J]. 南京社会科学, 2020(12): 43-50.
- [5] 《列宁全集》第55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0.
- [6] 《列宁选集》第2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 [7] 李全喜, 周炜杰. 列宁《哲学笔记》中的实践思想及当代启示 [J]. 学习论坛, 2023(6): 94-101.
- [8] 杜娜叶夫斯卡娅. 哲学与革命 [M]. 傅小平, 译.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0.
- [9] 《列宁选集》第1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 [10] 《列宁全集》第22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0.
- [11] 《列宁全集》第33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0.
- [12] Anderson K. Lenin, Hegel, and Western Marxism: a critical study [M].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5.
- [13] 蒙木桂. 杜娜叶夫斯卡娅对列宁辩证法思想的解读及其评价 [J]. 南京社会科学, 2011(2): 61-65.
- [14] 《列宁全集》第6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0.
- [15] 《列宁全集》第8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0.
- [16] Dunayevskaya, Marx's Philosophy of Revolution in Permanence for Our Day: Selected writings [M] // Marx's Philosophy of Revolution in Permanence for Our Day. Brill, 2018: 9.